

# 今文选

拾

今文言

主编 刘斯奋 副主编 刘斯翰

编纂 陈永正 徐晋如

◎ 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废止文言，推行白话，并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可以说成果丰硕，佳作如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经历史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历久常新的文章，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风格鲜明，生动活泼，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主编 刘斯奋

副主编 刘斯翰

# 今文选

拾

今文言

编纂 陈永正  
徐晋如

选题策划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文选. 今文言 / 刘斯奋, 刘斯翰主编; 陈永正分  
册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71-0882-5

I. ①今… II. ①刘… ②刘… ③陈… III. ①社会科  
学—文集②文言文—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H1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398 号

责任编辑: 周汉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0.5 印张

字 数 38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7-5171-0882-5

《今文选》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斯奋

副主任：刘斯翰 徐南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虹昭 区 鋐 刘斯奋 刘斯翰

刘卫国 张 均 张 维 陈永正

陈艳冰 陈淑梅 林亚杰 徐南铁

徐晋如 黄统荣 梁基永 谭运长

编纂出版助理：（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谧 叶 蓝 刘 晖 张呈前 谭树正

## 【总序】

2010年1月,刘斯奋、刘斯翰、陈志红、陈艳冰、金岱、徐南铁、蒋述卓、谭运长等八位广东学者,联名在《羊城晚报》和《粤海风》杂志上发表《岭南宣言——关于救治当前学风文风的呼吁》。

文如下:

文风腐败正在侵蚀民族文化的肌体!

拜金主义正在吞噬知识界的灵魂!

学统崩摧,文脉衰颓,已到了几难振拔的境地!

我等几名广东学人,秉承岭南先贤“学贵自得”、“学以致用”的精神,向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

挺身而出,端正学风,改造文风,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

当前文风积弊之深重,可谓怵目寒心,兹举数端——

一曰以艰深文饰浅陋。一个可以简捷明白说出的意思,偏要故意弄得隐晦曲折;并无真知灼见,却满篇生搬硬套的外来名词术语,加上颠三倒四的“语法”,让读者头昏目眩,如坠五里雾中。这种“下决心不让人看懂”的文风,其影响之恶劣,为祸之巨烈,可谓亘古以来所仅见。

二曰以抄袭冒充研究。不去下苦功深入钻研,只从现成资料或别人的文章中东剪一段,西抄一节,改头换面,颠倒次序,拼凑起来,便堂而皇之地称为科研成果。一旦蒙混过关,名利到手,便窃幸得计,乐此不疲。为学如此,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三曰以繁琐支撑空洞。将一个常识性的论题放大又放大,分割又分割,叠床架屋,堆砌引文,美其名曰:追根溯源,一网打尽。实则不过是借助大量杂碎材

料,以遮掩其判断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空洞。打肿脸充胖子,借以吓人。

四曰以模式扼杀创造。把国外自然科学论文的若干规矩,变本加厉、生搬硬套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形成固定格式。其可笑者,如规定论文引用文献的数量,其中又规定洋文献土文献各半,即可见一斑。按照这种模式,只要将一批现成的结论,加上一堆废话,像机械制造那样,填充到模具里去,就成了学术成果。在这种模式统制下,独创之见遭到扼杀,论述简明反受排斥。其荒谬悖理,较之古代科举八股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曰以矫情代替真情,以低俗排挤高尚。明明对生活麻木不仁,远离老百姓痛痒,了无真情实感,却偏要故作深沉,发大感慨。不以真善美导乎先路,反以假恶丑颠倒众生。为吸引眼球,不惜肢解文法,灭裂文字。词语尘下,意识卑鄙。

弃起码之廉耻,视高尚为仇敌,有如污浊横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种种流毒深广的文风,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任其泛滥,无数学人文士宝贵的生命和才智,将在伪学术、劣文学怪圈中被消磨殆尽,成为浑浑噩噩的牺牲品!

更有甚者——

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华文化坠入虚妄、空洞、琐碎、矫饰、卑下的危险境地!

面对严重的危机,改造文风刻不容缓!

我们主张——

一、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

二、提倡真知灼见,反对言之无物。

三、提倡真情高尚,反对矫情低俗。

四、提倡简洁明快,反对晦涩繁琐。

五、提倡精研独创,反对蹈袭拼凑。

自古以来,文章分“有用”之文和“无用”之文,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无用之文”,但即使“无用之文”,也应该切戒浮靡,作者要有起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样,文章的风骨和作者的自尊才有所依托。总之,为文必须认真、诚敬,决不可苟且、敷衍。

态度决定一切,为文者态度认真、诚敬,文章就必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有真思想、真性情,文章便内容充实,令人读之感发兴起,如对良师益友。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文当然需要文采,讲究修辞。但过分的枝蔓,既

遮蔽真情的表达,也妨碍读者的接受。特别在当前,更有必要提倡简洁明快,我们甚至宁可“裸奔”——素面朝夭,至少真我还在!

当今文风败坏,根源在于见利忘义。当体制为一种文风提供利益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可供投机取巧的模式,令大批学人文士身陷其中。

必须彻底打破这种“模式+量化”的评价体制。这一套体制,从根本上混淆了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的区别。流弊所及,使文坛混同名利场,学术变成“生意”,将泡沫视为繁荣,以数量取代质量。结果为伪学术、劣文学提供“有理合法”的土壤,使腐败文风得以大行其道。

改造文风,说到底还要从学人文士的人格修养入手。

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倡“养气”。我们今天的文风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学人文士们泄了“气”。

孟子说“养吾浩然之气”,以达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华文明历千百劫而不断重生复振的气脉所系。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挑战,自身发生了重大调整,但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气脉不能断!知识界的责任与使命、尊严和自信不能丢!

噫戏!凡我有志之士,振作,集结,奋起!

以我们的浩然之气,支撑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宣言》发表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

如果说,《岭南宣言》是“破”,是对当下文风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并阐明自己的主张。那么,作为“立”的方面,我们觉得,还应当通过选文的方式,向全社会推荐优秀的语文范本,以推动良好文风的复归与发展。

事实上,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废除文言,推行白话,并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经过近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可以说成果丰硕,佳作如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经历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历久常新的文章,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风格鲜明,生动活泼,要言不烦,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基于这样的认识,《今文选》的编纂,就是以近百年来白话文的成果为主要

对象,以内容充实,识见超卓,文笔严谨,辞情并茂作为入选标准,突出作品的独立审美价值。目的在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向读者展示百年以来,白话文运动在除文学创作之外的其他各种文体中,其发展的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文体的承传性和整体存在考虑,在选题中也顾及到同时期的文言文作品。

文章入选的范围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直到 20 世纪末的各类文体。共分十个类别:

1. 人文——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评论文字。
2. 社科——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领域的评论文字。
3. 论争——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论战、争鸣文字。
4. 时评——著名报社、报人创作,对时事发表的社论、评论。
5. 译作——译介外国作品的篇什。
6. 艺谭——包括各艺术门类如美术、书法、音乐、电影等的艺术评论和漫谈。
7. 序跋——包括序言、导言、跋言、卷首语、后记等。
8. 品鉴——对收藏的艺术品进行欣赏、品评、记录、谈论的文字。
9. 近代政论——1840 年至 1919 年以前政治领域的有关论述,包括宣言、檄文等。
10. 今文言——为“现代文言文”,即“五四”以后的文言文。

至于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等等),白话文运动以来无疑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考虑到此前已出版过多种选本,因此不纳入本文选之列。

入编的选题按类分为十卷,主编刘斯奋、副主编刘斯翰。各卷编纂(按姓氏笔画排列)由王虹昭、区拱、刘斯翰、刘卫国、张均、张维、陈永正、陈艳冰、陈淑梅、徐南铁、徐晋如、黄统荣、梁基永、谭运长诸先生以独自或联袂的方式分任。其他参与编选工作的人士,于各卷中分别标明。

《今文选》每卷内容的构成为:(1)前言,(2)入选文章,(3)作者简介,(4)文章评点。其中文章评点因文体特点、选家个性不同而各施其法,不作统一规范,以彰显自由活泼之文风。

百年之间所积累的文章数量异常巨大,要做到完整无缺地搜罗、通读,固然是不可能之事。即使是试图部分这样做,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将近百年的好文章“一网打尽”的妄想,而充其量只能努力做到凡是收入本文选的,都必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所谓“管窥蠡测”。倘能臻此目标

于万一，于愿已足。

当然，由于我们的眼光和水平所限，也由于文章之为物，从来就不存在可以“量化”的什么标准，再加上白话文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好文章，入选本文选的是否都是或者就是好文章？也肯定会有不同看法。那么，就姑且以此作为“引玉之砖”，以待更加成熟、完善的选本出现吧！

最后，还要对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和天涯社区网站，表达我们的谢意。

刘斯奋 刘斯翰

2013年1月

## | 前 言 |

文言，源于春秋时期的“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古代贵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际；异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当时华夏民族的典范语言，经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这种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是口语的提升，自然要比口语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可以使“言”更充实，有了“文”的“言”，才能书之竹帛，传之久远。文质兼备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精英共同选择的文化载体之一，曾经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面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言文是一种完善、完美的文体。它正如梁启超所说，“许多精湛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庄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达的；绝世风华的唐诗宋词，是用文言创作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载起来的。时移代易，文体不断演化，各种体裁，各种流派，杂沓纷呈，万变不离其宗，文言文的整体语言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恒定的形态。先秦时的《左传》、《论语》，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语汇、文法上都没有太大区别。这种超稳定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言文也影响到同属汉文化圈中的周边国家，百十年前，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的官吏文人还可以用文言与中国人笔谈。

不过，这种状况，到了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却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就是：白话文的勃兴并最终成为主要的通行文体，以及文言的式微并最终被彻底边缘化。这种转变，无疑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非仅仅由于当时一批提倡者，发表了一通现在看来不免过于偏激的言论所能实现的。事实上，仅仅过了一百年，新兴的白话文就因为适应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进、文化向社会大众的普及和东西方日益密切交流的需要，迅速大行其道，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时至今日，白话文还处于继续发展的阶段，还远未成熟，甚至还出现某些低俗化的现象，但是，这一趋势已成定局，不可逆转。

当然，确认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对文言文的价值和作用作更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应当并且必须有更加客观和全面的把握。

事实上，文言文与白话文，本是二元一体的关系。两者同出一源而并流，共同滋养着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话文，其实并不需要完全废止文言文。梅光迪认为：“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无可讳言，文言有其局限性，它的语言形式难以成为现代政治表述的载体，不适合表达科学技术的内容，不可能被所有人了解和接受。它过去不属于大众，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大众。但它是一种遗产，一个源头。遗产需要继承，源头不能斩断。因此，早在白话文兴起之初，就有人设想过，可以实行双轨制，即在新闻、科技等领域使用白话文，而文史、艺术等依旧使用文言。白话适于时俗，文言适于典雅，这也算是一种“得体”。蔡元培曾预言：“我也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地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文化运动后，文言文虽失去主流地位，但并未被祛除净尽，而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文言应用场合依然十分广泛，在最初的官方文件、报章中，文言还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民国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抱怨说：“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后来他在《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中又感叹，当时报纸的文体主要还是文言，他在1934年对《大公报》和《益世报》中白话与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过统计，发现“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来，报纸似乎是全民大众的读物，但在那个时代，报纸主要在大中城市发行，读者对象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读者群，尤其喜爱并习惯浅近的改

良体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风雅,他们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雅文化,并认同文言文的文化价值,试图去超越自己,举止谈吐也仿效那遥不可及的知识阶层、贵族阶层。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字纸也须敬惜,掌握文字的读书人是值得尊重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识,早已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这个传统虽曾受政治干扰而遭到破坏,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始终还是怀着敬畏之心。

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文言应用也十分广泛。南北各都会以至中小城镇,文人经常组织雅集,文酒风流,唱酬切磋,留下丰富的诗文作品,即如邀约小柬、集会序言、书画题识等应酬文字,也颇具雅人深致。文友往来信札,一般民众的家书,以至广告、市招、揭帖等,都常用文言。由此观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叶茂,已深入社会的各阶层,也为部分群众所接受,绝非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所能彻底摧毁的。

当时南北各高等学府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史课程,学生研读古代文献,熟习文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的各大学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鼓励学习文言文及诗词写作。中山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是“复古”大本营,中文系主任古直强调师生要读经,并能作流畅的文言,古典文学内容的毕业论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写作。汪国垣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要求学生能作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立专科学校,始建于1920年,唐文治任校长,古文家钱基博任校务主任。历任教师有章炳麟、钱穆、鲍鼎、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周予同、陈衍、陈柱、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等赫赫有名的学者,而学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吴其昌、陈中凡、蒋天枢、范敬宜、唐兰、王遽常、钱仲联、冯其庸、吴孟复等,后来都成了当代文史研究专家。凡是毕业于无锡国专的都是文言好手。

当时中学语文教学也仍以读文言文为主,一直延至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大学的入学考试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响到中学文言教育。龚启昌撰《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一文评论:“日前看见报上载江苏省会考试题一律用文言。现在国内各大学的考试,及考试院举办的考试,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无怪乎现在的中学生甚而小学生,你不教他文言,他还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学、大学入学试验的影响于学生心理与态度,比了行政机关的一纸号令,或文人的两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20 世纪上半叶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开办的正规小学外,更多的是遍布城乡的私校以及各类家塾、学塾,不少人家选择后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经典是学童必读的课本,《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等更是习用的启蒙教材。一般民众从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会受到先圣前贤思想的影响。民间百姓的书信、契据等应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夹杂或纯用文言,1931 年张廷华编《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一书序云:“今者国体变更,文运陵夷,而公私函牍,以此体为尚。”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引车卖浆者的言谈,也许会比当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由于推行了包括“批判厚古薄今”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文言文的存在空间进一步遭到大幅压缩,但在中小学课本中仍旧选入一定数量的诗词歌赋和古文,大学文科也仍旧开设古文课程。而暗中传授,私下研习者更是如星星之火,存在于广大民间,绵延不绝。这证明,根植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土壤中的文言文,作为民族文化取之不竭的源头,仍旧顽强地保持着生命力。

## 二

文言文的写作,作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呵护和继承,近百年虽然总体上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却始终未曾中断,而是代有作者,时见新章。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时期(1911—1920 年)

辛亥革命后,政体更张,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在新旧交替的时期,风云际会,人才迭出,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学观点都反映在当时知识精英的文章中,真是异态纷呈,精彩绝伦。民初十年,可说是现当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当时各种文学流派中,最触目的当数以梁启超为首的“晰于事理,丰于感情”的“新文体”派。它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全国以至于海外华埠通行的“报章体”。此派文风,纯以气胜,其末流则夸张浮滥,格调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华洋溢,学问宏深,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都是杰出的学者,黄氏擅骈文,“风骨遒上,辞气澹

雅”，钱玄同文章汪洋恣肆，吐泻无余。

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高旭、柳亚子、陈去病、朱剑芒等诗文皆擅，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

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鸿儒硕彦。他们当中有桐城派、湘乡派的古文家马其昶、叶玉麟、姚永朴、姚永概、林纾，有专学魏晋文的王闿运、吴虞、冯开，擅骈文的孙德谦、李详，此外还有严复、缪荃孙、冯煦、陈三立、陈衍等一大批旧文人。这些人学问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为范式。

##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1920—1937年）

1920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话为国语，中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编撰，这无疑宣告白话文运动已取得最后胜利。

文学艺术是各历史时期游离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栖居之地。社会大变动后，一部分旧文人选择了逃遁，以“大隐”或“小隐”的方式，遁于市井，遁于山林。他们超然物欲之外，遁入自己的内心深处，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实现自我封闭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诗词、琴棋书画则是文化遗民最后的遁逃之所。这群文人以前清的“遗老遗少”居多，他们是文言文最忠实的维护者，不懂得或不屑于写白话文，终其一生都用正统的文言文写作。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文章质量最高。

另一批人可称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员成分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提倡“新文体”的梁启超及其众多的追随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谓“浙江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以及南社成员柳亚子、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学衡派”人士，中有吴宓、柳诒徵、胡先骕等。这些人在传统功力上大体不及老辈，主张“改良”文言，主张文字要条达舒畅，但毕竟才人甚多，亦不乏传世佳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一直坚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国维、黄侃、吴虞、黄节、钱基博、汪国垣、刘永济、陈寅恪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坚牢的根据地，数十年来，古文承传，薪火不绝。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时技痒，勒马回缰，制作文言，其中颇有可观之作。

## 三、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1937—1949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文人随国民政府迁

往内地，寓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还有一些人滞留在敌占区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战八年期间，国难当头，人们已无心弄月吟风、整饰文字，与上一阶段相比，文言文的势头显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继续创作，歌颂慷慨捐躯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悯民间百姓的疾苦。国统区大学师生坚持教学，不少文科学者如钱穆、钱钟书、饶宗颐等仍用文言撰作。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敌占区中，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汪伪政权以“复兴中华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龙榆生、陈柱尊、李宣侗、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并出版《同声》、《新亚》、《国艺》、《中国诗刊》等刊物，时有文言文刊出。

抗战结束，内战又起，民不聊生，文学艺术更无足道矣。文言衰势益甚，只剩岭南一隅之地，尚保留旧日诗文创作传统。1947年至1949年10月，《广东日报》文言副刊《岭雅》，发表一大批粤籍文人的诗文，这已是中国大陆旧文化的回光返照了。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1949—1976年）

20世纪50年代伊始，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文体革命”。一切文学都成了宣传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被认为是封建文化象征的文言，非但失去了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会各个领域之外。教育体制全盘改造，采用苏联模式。大学中文系中没有现当代文言文的位置，文学研究者更是视之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此后20多年间，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种出版物中，当代文言文写作几乎绝迹。虽然如此，在民间，文言文尚维持一线生机，并在艰难发展，犹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绝。旧派文人如叶恭绰、胡先骕、马宗霍、郑逸梅、方孝岳、朱庸斋等时作短文序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大数量的文言作品当为文人的书牋和日记，这些文献是珍贵的时代实录，有待后人发掘和整理。上世纪80年代，文艺复苏，劫后余生的老人们从尘篋中翻出少量旧稿发表，但已是明日黄花了。

1955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课分为“文学”与“语言”两门课程。

“文学”课本内容全部改为古典文学，按文学史顺序选编。历时短短两年的改革，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不少青少年自此爱上古典诗文，并尝试写作。

最可称异数的是，1961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各项政策一度宽松，张伯驹时为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居然私下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结成“非法团体”、“春游社”，中有于省吾、黄公渚、陆丹林、黄君坦、罗继祖、张江裁、

周汝昌等知名人物，“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逸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后来这个“反革命组织”虽被公安厅立案侦破，而当时所写的三百多篇文言文却得以留存下来，终于在40年后编成《春游社琐谈》一书出版，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国华人小区，似乎成了旧文人荟萃之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国各地一些传统文化人，在政权变更前夕，乘桴济海。诸如潘重规、林尹、陈含光、高明、成惕轩、台静农、李晋芳、李渔叔、于大成等东渡鯤洋，黎国廉、刘景堂、曾克崙、赵尊岳、陈本、张斌、曾希颖、饶宗颐、罗忼烈、傅子余、苏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纵、王叔珉等远游海外。他们数十年来坚持文言诗文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赖以一脉延绵。

#### 五、改革开放时期（1976—201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步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微阳初照，寒蛰昭苏，百废待举。各地纷纷成立诗社，复出的老干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满怀热忱，重新写作诗词，并结集出版。在这一时期，诗文集的序跋成为最常见的文言文文体，作者多为诗词家或新文化人士，年轻时未经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于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一旦好奇执笔，每以白话之法为文言，气格不纯，况复年事已高，才华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与上辈文人相去甚远，绝大多数只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进入21世纪，社会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可庆幸的是，中青年学者已关注现当代文言文和诗词，不少人还致力于创作实践，网络上时见发表，其中不乏佳章。大、中学生中不少人喜爱并尝试写作文言。民间动态更不可忽视，学童的古文、诗词教育方兴未艾；民间学者正在成长，并出版文言体裁的有分量的著作。最近十年间大陆地区的文言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佳，远过于前50年，中青年作者的水平亦较胜于上一辈。路子正，立意深，格调高，文言正统一脉后继有人，更不必担忧传统文明的灭绝了。

台湾、香港地区，是近半个世纪的文言文最坚固的营垒。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依然文风鼎盛，诗社文社林立。大学中文、历史课程，多用文言，毕业论文，亦多以文言写作。近年随着岁月更迭，教育制度的改变，加以老辈文人的日渐凋零，文言文创作已今不如昔，总体来说，亦似稍逊于大陆地区了。

20世纪文言文文献，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赖报刊杂志以留存。较早有《南社丛刻》，收录社员诗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为主的刊

物有《学衡》、《甲寅》、《青鹤》等,四十年代则有《国艺》、《文史季刊》、《岭雅》等。

《学衡》,吴宓主编。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1933年停刊,计出79期。此刊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职志,办刊目的是要证明“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每期有《文苑》,列文录、诗录、词录三子目,主要作者有胡先骕、柳诒徵、吴宓、吴芳吉、梁启超、王国维、汪国垣、王易、林学衡、邵祖平、王澐、曹经沅、赵熙、向楚、庞俊、方守敦、方守彝、姚锡钧、陈衡恪、李思纯、林思进、叶玉森、黄节、陈寂、曾广钧、夏敬观、曾朴、林损、陈曾寿、马一浮、张尔田、朱祖谋、曾习经、陈寅恪、刘盼遂、陈三立、瞿宣颖、叶恭绰、缪钺、邓之诚等数十家。其中坚人物被称为“学衡派”,皆为贯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构成了当时中国的精英文化群体。

《甲寅》,章士钊主编。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同年11月停刊,共出10期。章氏出任教育总长后,于1925年7月在北京复刊,1927年2月停刊,共出45期。先后撰稿人有陈独秀、张东荪、蔡元培、梁漱溟、吴承仕、沈钧儒、黄侃、钱基博、陈三立、章炳麟、杨树达、叶德辉等。后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尊孔读经,坚持使用文言文,被认为是“封建复古主义者的阵地”。

《青鹤》,陈贻一主编。1932年11月创刊于上海,1937年7月因抗战爆发而终刊,计出114期。为同人刊物。创刊号刊布“本志特约撰述”共105人,有陈衍、丁福保、王蕴农、刘承干、梁鸿志、周瘦鹃、黄濬、傅增湘、孟森、章士钊、蒋维乔、夏仁虎、吴湖帆、冒广生、于右任、钱基博、吴稚晖、高梦旦、陈巨来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学者。是刊特重文献保存,近代名人之日记、笔记、序跋、书札、年谱、诗文集,分期连载。被时人看成是旧文人绝地反击、屈指可数的一块阵地。

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文科学刊也采用文言。如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刊《文学杂志》,古直主编,每期均登载师生的文言诗文。

《文史季刊》,王易主编,国立中正大学出版。是刊1941年3月创刊,初拟每三个月发行一期,每年四期,合为一卷,然仅至第二卷第一期,却未再出版。是刊栏目,首学术论文,次文录,次诗录,次词录,次英诗选译。作者有胡先骕、王易、吴宗慈、陈颖昆、萧宗训、涂世恩、王英瑜、陈树人、王迪纲、欧阳祖经、程学恂、林庚白、张景煦、吴天声、胡献雅、周岸登、沈尹默、胡光炜诸家。

《岭雅》周刊,陈寂主编。1948年5月3日创刊,计出70期。原为《广东日报》副刊,自45期后,改为《中央日报》副刊,傅静庵主编。是刊主要分文录、诗录、词录三栏。作者主要是粤籍或寓粤人士,有詹安泰、吴三立、佟绍弼、陈湛铨、黄